

在毛澤东同志的旗帜下

陈 伯 達

鋼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編印

一九六八年三月

最 高 指 示

对于馬克思主义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說明一个两个实际問題，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績。被你說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

《整頓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一七頁

目 录

无产阶级的杰出理论家——陈伯达同志·····	(1)
青年人的方向·····	(一九四〇年八月) (4)
旧阶级本性的改造 (学习随笔之一) ·····	(一九四二年六月) (7)
回答于炳然同志·····	(一九四三年七月) (9)
思想的反省 (学习笔记之二) ·····	(一九四二年八月) (11)
关于马克思主义等等 (学习笔记之三) ·····	(一九四二年九月) (15)
关于党内生活·····	(一九四三年一月) (20)
党与党的理论《读书杂记》·····	(一九四三年三月) (24)
人性、党性、个性·····	(一九四四年七月) (25)
读《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一九四四年春) (29)
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五月) (45)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国革命·····	(一九四九年) (49)
列宁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和导师·····	(一九五一年一月) (52)
毛泽东论中国革命 (又名“论毛泽东思想”) ·····	(一九五一年) (56)
毛泽东同志论革命的辩证法·····	(一九五二年五月) (80)
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二年) (89)
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	(一九五八年七月) (98)
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	(一九五九年五月) (109)
厚今薄古、边干边学·····	(一九五八年三月) (118)
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	(一九五九年) (122)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132)
在人民大会堂科学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四月) (137)
在大风大浪里成长·····	(一九六六年八月) (140)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十月) (142)
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 (151)
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闭幕词·····	(一九六六年) (152)
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 (153)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 (160)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	(一九六七年十月) (170)
编后·····	(174)

无产阶级的杰出理论家——陈伯达同志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忠实执行、勇敢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为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所爱戴、所敬重、被党内一小撮顽固走资派和反革命阴谋集团以及五·一六分子所刻骨仇恨的陈伯达同志是我党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周总理指出：“……陈伯达是毛主席、林彪同志领导下我们党最好的理论家。在林彪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提倡下，陈伯达同志最善于发挥、善于阐明毛泽东思想。”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土地改革到文化革命，陈伯达同志数十年如一日，一贯紧跟毛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作了不疲倦不调和的斗争。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陈伯达同志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于一九四四年写出了《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论十年内战》等优秀作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大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热情歌颂革命的群众运动，无情地批判和揭露了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反动本质。这在我党七大以前还是少有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陈伯达同志运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用锋利的笔写出了《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无情地揭露了美蒋反动派，把蒋介石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投降帝国主义出卖祖国、背叛人民的反动理论驳得体无完肤，为摧毁美蒋反动政权作了有力的舆论工作。这两篇著作是射向美蒋的重型炮弹。

解放战争后期，陈伯达同志坚决捍卫了毛主席的城市工商业政策和土改政策，并参加了土改。

一九四九年，陈伯达同志随同毛主席去苏联，克服了很多困难，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九五一年，我党成立三十周年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抛出了大毒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篡改党的历史，抬高刘少奇，贬低毛主席。陈伯达同志挺身而出，发表了《论毛泽东思想》（又名《毛泽东论中国革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与《三十年》针锋相对。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是陈伯达同志主持的。他极端的负责任，表现了对毛泽东思想、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热爱，无比忠诚。《矛盾论》、《实践论》发表之后，陈伯达同志紧紧跟上，撰写了《毛泽东同志论革命的辩证法》，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

一九五四年在毛主席的主持下，陈伯达同志参加了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工

作。

在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时期，陈伯达同志任党中央农村工作部付部长。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陈伯达同志立场坚定，与邓子恢的“反冒进”“砍合作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党七届六中全会决议，就是陈伯达同志作的说明。

一九五六年，正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关键时刻，陈伯达同志随毛主席去莫斯科并参加起草《莫斯科宣言》这一伟大历史文件，为捍卫马列主义的革命原则，跟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五八年，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创刊了。担任主编的陈伯达同志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热情地歌颂革命的群众运动。

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猖狂地反对毛主席，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陈伯达同志立场鲜明地写了《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等文，猛烈地抨击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

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从批判多列士、陶里亚蒂到批判赫鲁晓夫、科西金之流，陈伯达同志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重要文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二十五条》）曾由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拟了一篇稿，陈伯达同志也拟了一篇稿。结果是毛主席批准了陈伯达同志的稿子，而邓小平写的根本不能用。

在农村四清运动中，陈伯达同志亲自到天津小站去蹲点，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路线。后来，陈伯达同志参加了起草农村四清运动的《前十条》和《二十三条》的工作。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的一篇报告中恶毒攻击毛主席，胡说毛主席的“调查研究”“过时了”。该报告转到伯达同志手中时，伯达同志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划掉了否定“调查研究”的段落，使得刘少奇这篇报告未能发表，粉碎了刘少奇的阴谋。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同志坚决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与刘邓反动路线进行了激烈的针锋相对的毫不留情的顽强斗争。是伯达同志最坚决地支持了江青同志所主持的京剧改革。

是伯达同志参加了《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与定稿工作，与《二月提纲》及其泡制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六、七月份，毛主席、林副主席不在北京，刘邓大派“灭火队”，陈伯达同志挺身而出，坚决反对派工作组，坚决反对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针锋相对。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后，是陈伯达同志第一个贴出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炮打刘邓黑司令部。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同志作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深刻地阐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受到了毛主席的好评。正是在这篇讲话中，陈伯达同志在理论上彻底粉碎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反动的“血统论”扰乱阶级阵线的大阴谋。去年五月十三日，在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陈伯达同志受林副主席的委托，亲

青年人的方向

(一) 一年之計在于春

一个人终生的事业，应该在青春的时候有个决定的方向。这正象古语说：“一年之計在于春”。俗话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也就是这个意思。那末，什么是青年人正确的方向呢？

(二) 为绝对大多数人做工

为绝大多数人而做工——这是青年人基本的方向，这是宇宙观与人生观的问题。各位青年朋友现在都离乡背井的流浪在外面，在还未离开自己家乡时，一定会有人把各式各样的宇宙观人生观告诉你们：或者会告诉你要安分守己，成家立业，抚妻生儿这一套；或者会告诉你要图谋升官发财；或者会告诉你要明哲保身，不要关心天下国家的事情；或者告诉你要为皇帝（指过去的）做工；或者替某些头领及某些最少数人做工，但这些都不是我们青年人所需要的方向。我们要的是和我们自己理想的方向，——新的完全适合青年利益，适合人类利益的方向——这方向就是：为绝大多数人做工，也不是为某些少数人，为他们的地位和享乐做工。

这个方向是否对呢？完全是对的。为少数人当牛马，或单单只为个人谋幸福，只为狭小的家庭谋幸福，这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意思呢？一个高贵的人格是要能为了大多数人牺牲自己。这和那种为少数人当奴才，甚至盲目地为他们的吃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愚蠢行为，比较起来，就好像是天与地的分别。为少数人牺牲，它不但没有意义，并且它最后一定是空虚的。这是历史发展决定的，大多数人是一定能得到最后胜利的，那些和大多数人的利益违反的少数人，一定是注定没落的。历史已把这前途老实地告诉我们了。

为大多数人，同时也是为自己。个人离开大多数是不能生存的，这是真理。个人的生命是和大多数人的生命是分不开的，是建筑在大多数人共同劳动生活的基础上的。像鲁滨逊的故事，只是故事，在事实上却不可能。

决定了这个方向，即决定了自己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与做奴才，做走狗的人生观是不同的。我们要象人一样的活下去。和大多数人在一起，为他们谋解放，为他们而做工，这才是真正做人的生活。

事实上，在一种旧的恶劣的环境中，要决定这样的一个方向，是很不容易的。即我自己也是经过许多困难、奋斗，才发现了为大多数人奋斗争的方向，并不是从母亲生下来就知道的。这方向的决定，要能打破旧的精神束缚，要能与恶劣环境奋斗，这也就是要依靠我们的理智，又要依靠我们行动的决心。

（三）实际与幻想

我們所谓为大多数人而做工，这是有标准的。实际就是标准。这就是说明决定一个方向，不是从口头上表现出来，而是要从实际上表现出来。只是口头上就是为大多数，而不能做到实际行动，这就不是真正为大多数；只有切切实实地，不断地为大众谋利益，为大多数奋斗，反对压迫，反对剥削，不为少数人利益而牺牲大多数，而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时候，则愿意为大多数而牺牲自己，这才是真正为大多数。

所以我們要认识一个人，是要看他是否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为大多数。如果只空口就是为大多数，那如不是说漂亮话，就是大骗局。

实际是我们的标准，这我們说过了。但实际正是一种极复杂，极曲折，同时也是极困难的过程，我們决心投身到实际当中去，这是一件事，我們是否能尽起实际的责任，这又是一件事。正因为实际是极复杂极曲折的，所以实际时常和一些人主观的幻想不相同，也因此，我們要在实际上来考验我們自己，检查我們自己，对于我們的工作，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我們知道时间是发展的，地方是不同的，离开了时间与空间是走不通的。离开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就不会真正知道群众的状况和要求，也不会真正帮助群众奋斗，也就是不能够为大多数人做工。要达到这种实际工作的目的，就要我們能和民众生活在一起，处处具体地了解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青年人在甲地工作的方法，到乙地奇怪走不通，这是说明他修养不够，沒有具体地经常地体验到群众需要的是什么。不知道群众要什么，是沒有办法替群众做工的。

我們处世态度是怎样团结群众，启发群众，提高群众。我們必须认清为大多数人服务绝对不能脱离实际，脱离实际的便是幻想，我們要反对。

（四）路是危险的

这就是说，我們是不能平平坦坦地向前进的。敌人是不断地在危害我們，破坏我們，离间我們，软化我們。历史沒有过不经残酷的斗争而得到成功的革命斗争。不仅如此，就连统治者自己互相间的斗争，也常闹得你死我活。敌人是不会轻放下自己的武器的。

中国革命过程是非常艰苦残酷，而又是长期的斗争。我們周围的敌人非常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各种顽固派……他們是不会轻易让人民得到解放和光明的，他們时常布置了天罗地网，来围剿革命的战士，他們时常用威胁、欺骗、利诱来软化青年的志士。一个决心投身革命的青年，是必要知道在我們面前是危险重重的。我們必要有不怕各种危险的决心，而后才能在危险突来的面前不至惊慌失措，束手无策，或悲号涕泣，也才可能去克服各种可能碰到的危险。

要革命而怕危险，就不能做革命者，这是我們每个青年需要知道的。在另一方面，我們又要知道，我們是可能克服各种危险的，我們应有战胜危险的勇气，而不能在危险面前低头，这就要依靠我們的实际工作和学习。在危险不可避免的时候，那末，我們的答案：“朝闻道，夕死可也”。为真理而死，为多数人而死，这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

(五) 不屈不挠向前进

↑ 我們知道，工作是困难的，路是险恶的，但是否就中途妥协，放下旗帜呢？很多讲革命，但过一些时候，由意志软弱，经不起磨炼，以至于叛变。我們革命者一定要经过长时期的和群众在一起，启发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我們一定要熬得住痛苦，持久地熬下去。一个真正的可宝贵的革命者必须在最艰苦的时候熬下去工作，我們要懂得保护身体来坚持革命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当给敌人抓住，我們决不屈服，决不怕牺牲，不怕死，不怕坐牢。坐牢也是个残酷的斗争，向苦痛生活斗争。中国许多革命斗士，都是在监牢里熬过来了十几年的。我們青年人要学习这一切榜样。

是否每个人能做到这样的程度呢？张国涛、汪精卫……这些下流的家伙就不能这样做。一个革命者能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地干下去，当然是不容易的事，但我们却必要有决心，要不屈不挠向前进。

我們一定要不屈不撓向前進，我們要有信心，因為最大多數人一定會得到勝利，我們一定會得到勝利。

我們有了目的，有了信心，在实际的考验中能贯彻，那就什么也不会怕，一定能得到胜利前途。我們既然在精神上有了寄托，既然了解真理，就会无所挂念，勇气也就来了，什么事也就干得成功，我們相信，世界最后是属于大多数人的，是属于青年人的。

摘自《解放日报》一九四〇年八月五日

旧阶级本性的改造

——(學習隨筆之一)——

陈伯达

“人类的本质决不是各别的个人所特有的抽象，人类的本质在其真实性上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

小资产阶级的本性：在生活上的特点是狭小和散漫，在思想上的特点是片面和幻想。无产阶级的本性相反：在生活上的特点是大量和集中，在思想上的特点是全面和真实。“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把小资产阶级的本性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本性，其所以不容易：一方面，因为我们周围的广大小资产阶级时常会影响我们，另一方面，则因为个人在平日小资产阶级生活中形成起来的习惯和个性带有一定的顽抗性。

各色人等对于无产阶级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司马迁说过一句话：“戴盆何以望天？”我很小在乡村生活的时候，总以为天是和我們周围的山头连接的。这是对于天的一种看法。后来有人带我上了山头，伸手摸不着天，才知道天比我所知道的要高要大些，可是，又还以为天是在某个一定的地方和地相连接的。虽然因为到了山头，开一些眼界，究竟所了解的，离开真实的“天”就还不止十万八千里。小资产阶级分子时常以为他的镜中所照的自己，就是无产阶级的化身，并且用这个自己的影子当作测量无产阶级的标准，其实“非天小也”，而是“其所见者小也”。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营垒，这只是表示他的生活和思想初步地向全面而现实方面转变（根据个人的生活、思想、经历和入党的时代、环境的不同，这种初步转变的程度并不一致），但要完成这个转变，就必要真正从山头上取去那个阻碍他“望天”的盆，第一，要他在生活上（这样形式或那样形式）长期地和无产阶级的血肉相贯通，第二，要他在思想上不断地否定旧的自己（旧部分继续地变化直到一般和全部的变化）。

我们这样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当其接近共产主义或加入共产党以后，时常有两种思想在一个脑袋中相互战斗，相互压迫：一种是无产阶级思想对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压迫，又一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对于无产阶级思想的压迫。这种思想的矛盾，纠缠在一个人的脑袋中，不是一时就可以马上完全解除的（这里所写的意思和范文澜同志六月九日发表的“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第二节的意思相类似，有的文字也和他的雷同了）。在这种思想矛盾的斗争中，一种人是无产阶级思想终于战胜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因而成为圆满的共产党员、真实的无产阶级战士；另一种人则终于被小资产阶级思想所吞没，竟至退出共产党，或甚至发展为丑恶的叛徒。在个别分子中这种思想斗争所表现的历史，同时反映为我党从来思想斗争的历史。

×

×

×

有两种特别的人。斯大林说：“我們共產黨員是特种式样的人。我們是由特別材料制成的。”这种真实的无产阶级战士，是特别的人，但他們是地上特别的人。此外，还有一种特别的人，就是天上特别的人。我們不少小资产阶级半知识分子（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属于这一类天上特别的人：一方面，度量是无限小，另一方面，吹牛却是无限大。要把这种无限小同时无限大的天上特别的人变成恰如其分的地上特别的人，需要很好的大夫，很好的医法。明朝时候，江苏高邮有一个人中了举人，高兴得发狂，笑不止，去求一个姓袁的大夫按脈，那个大夫惊叫说：“你的病已经没有办法了，再沒有几天可活了，你要赶快回去，迟点就回不到家了。”那个大夫还给他写封介绍信，叫他过鎮江的时候，再求教一位姓何的大夫。可是当他到鎮江的时候，病就好了。何大夫开看介绍信，里面写道：“因为他高兴得发狂，可以动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叫他忧愁抑郁，到了鎮江，就会好了”。于是他才恍然大悟，北面再拜感谢袁大夫。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于我們就象袁大夫这样好的大夫。毛泽东同志也有类似袁大夫的话告訴我們：“你們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說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我这样說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那些把馬列主义看成教条的人，使他們大吃一惊，苏醒过来，好拿正确的态度对待馬列主义”。但是这样好的大夫，好的医法，往往不是一下子就会被病人所认识的，除了有別人的指点以外，还往往要到病人经过一番苦痛的考验或被医治好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加以尊重，直至悅而诚服。所以，不但理论是实际经验的结晶，而且，理论的真正被人接受和深刻理解，也要依賴人的实际经验，这是一定的认识过程。整顿三风所以到今天才得提出，才成为大运动，这是不难理解的。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于二十二个文件，对整风运动，我作如是观。

（原载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延安《解放日报》）

回答于炳然同志

1943.7.14

拙作《旧阶级本性的改造》经过于炳然同志‘几回的思考与推敲’，据说，被发现了所谓“舍本逐末与淆乱视听”，“是对整风运动尚无足够认识的看法，流弊所至，会降低整风运动的意义，会松弛某些同志的学习情绪”。

问题不在于我的文章的好坏（我的文章写得不好，那是无可置疑的），而是在于炳然同志和我有思想上的隔膜。

据于炳然同志说，关于“两种特别的人”的说法，是我想‘套用鲁迅先生的调子’。如果有这件事，不见得就是不好。其实，我这里倒还是‘套用了’斯大林同志的思想。斯大林同志《论党工作缺点》引用过希腊人关于安泰的神话，这个英雄的力量，就是因为他靠在地面，敌人为了要战胜他，就“设法使他离开了地面，把他举在空中，使他失去与地面接触的可能，于是就在空中把他扼死了”，斯大林所举的这段故事，曾载在联共党史结束语最后一条，是我们这次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当中所有的，于炳然同志不妨再经过“几度思考与推敲”看看。我说我们不少小资产阶级半知识分子属于这类特别的人，一方面是“度量无限小”，另一方面是“吹牛无限大”，很明白的，所谓天上特别的人，就是指这种脱离群众的人，没有群众依靠的人，所谓“度量无限小”就是容纳不了群众（包括排内性与排外性）；所谓“吹牛无限大”，就是凌驾在群众现实生活之上的夸大与缥缈的幻想，以及个人第一主义。前者是宗派主义，后者是主观主义。这一段的意思和我文章前段所谓小资产阶级生活上的特点和思想上的特点，是相贯通的。还有，于炳然同志好象发现了什么“真理”，他说：“其实，这第二种特别的人并不存在‘天上’，确在人间，不但在人间，而且确还存在于我们党内”。但是，有的发现教人佩服，有的发现只能教人发笑。本来我也并没有工夫管什么天国的鬼事，于炳然同志现在替我担心起来，但这就‘天真’得够可以了。

于炳然同志认为我所说的医病，是需要医活“度量无限小”与“吹牛无限大”的病，因而表示了抗议。试问于炳然同志：难道整风运动就是不要医治这样的病吗？难道医治“度量无限小”的宗派主义，病治“吹牛无限大”的主观主义，就是“舍本逐末混淆视听”，就是“对整风运动尚无足够的认识”吗？

于炳然同志说：“如果说来，‘天上特别的人’与‘地上特别的人’，并无若何悬殊，其唯一的区别点，仅在于‘度量无限小，吹牛无限大’而已”。在于炳然同志看来，并无若何‘悬殊’，但是我看来，确实‘悬殊’得象天和地的分别一样。这就是我们思想上的隔膜，也就是关于“度量无限小，吹牛无限大”，有很不同的看法。思想上隔膜的出发点：一种是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出发，一种是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出发。前者是从整个群众运动，整个历史运动来看问题，后者是从个人的利害和个人的思想来看问题。于炳然同志说：“假如有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读过了陈伯达同志的那篇学习随笔以后，于是乎“恍然大悟”，“认识了自己的病根原来在于‘无限小’与‘无限大’，从此痛下决心，一方面，放大肚皮受气，磨尖牙齿吃亏，另一方面，三缄其口，不再吹牛，如此，而仅仅如此，就可以变成不折不扣的布尔什维克的吗”？从于炳然同志这里的话当中，看不出关于群众问题的意思，看不出关于历史唯物论的意思。一个共产党员斤斤计较的，只是“放大肚皮受气，磨

尖牙齿吃亏”，所想××（不清）的，只是“三缄其口，不再吹牛”（于炳然同志所说的“吹牛”意义，与我们所指的并不相同）……诸如此类的个人主义思想填满了一个人的头脑，那不只是‘有点问题’，而倒是大有问题了。

再看于炳然同志所谓“比较更值得注意”的问题吧。于炳然同志觉得我举的袁大夫治病的比喻（仅仅是一种比喻），比得‘不伦’不类，这当然也是见仁见智，不能相强。我的思想的集中点，是认为医病需要很好的大夫和很好的医法，以及关于实际与认识关系的过程。至于那个比喻里面的什么举人呀，如何发神经病呀，袁大夫呀，何大夫呀，如何医法呀，这些在我文章中所佔的意义并不算得什么。于炳然同志的计较、推敲，倒未免可笑了。不过，如果于炳然同志一定愿意作一个比较，那倒可以试比看看。那位举人先生所得到的是关于私人生活精神上的疾病，我们有三风不正的病，则是关于政治的精神上的疾病，病的内容及其表现完完全全不同，但其为精神上的疾病则一也（于炳然同志说那位举人“并非真病”。是否真病，可惜我不是医生，可不知道了）。这是第一比。至于医法呢？当然只有傻瓜（或者装傻瓜）才会不知道治两种精神上不同的疾病，有截然不同的医法。政治上的好大夫和好医法是关系整个民族、人类的命运，大夫需要人类最高的智慧，而医法则无限的曲折与复杂，如何可以把政治上的大夫和医法为普通医病的大夫和医法对立起来？于炳然同志以为我想以医治私人生活的精神上疾病的医法就当成医治三风不正的医法，那是于炳然同志自己的想法，我可不负这个责任。可是，如果说我们对于医治三风不正的病，不能“动之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那也不见得吧？我们要动之以革命的危苦之心，惧之以革命的失败，这点是不是必要呢？绝对是必要的。不然，为什么我们要说二十二个文件是百年来革命流血的经验呢？难道整顿三风不是历史上苦痛教训的结果吗？难道中央调查研究决定所写的“……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不就晋“动之以革命危苦之心”吗？难道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上所说的不正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不就是“惧之以死”吗？所谓“不伦不类”恶乎在？这是第二比。

于炳然同志似乎认为我们的整风运动不可能到了一定时候是会把病整好的。那位发精神病的举人“到了镇江，病就好了”，于炳然同志则认为我们整风运动，不可能“到了镇江”的时候，这真是“长夜漫漫何时旦”了。据我想来，思想革命是长期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整风运动对全党，对每个一定的同志，在一定时候，都必将在思想上、生活上、活动上得到一定的结果，而在我们党的思想历史上，党的生活历史上，党的工作历史上，都将开辟一个崭新的时期，对这一点，那是完完全全无可怀疑的。而且整风以来的事实已经在逐步地加以证明。对这一点没有信心，那就是“对整风运动没有足够的认识”，“流弊所至，会降低整风运动的意义，会松弛某些同志的学习情绪”。

以上所回答的，是关于于炳然同志文章的大节。其他枝节的东西，就不再多说了。至于就于炳然同志说（似乎如此说）我自比为何大夫，那真抱歉，我从来就没有这样想过，而且从来这样想：在整风运动中，我也是被医治的一个病人，我正在想努力克服自己的各种不好的东西。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甚至自命为何大夫——我相信自己还没有这样的狂妄，没有学得这样狂妄的功夫。在整风运动中，每个同志都着重反省自己，而于炳然同志倒也不妨在这些上面多关照一下自己。于党，于己，于人，都是会有好处的。摘自《解放日报》1943.7.23。

思想的反省

陈伯达

——(學習隨筆之二)——

人們都有自己一付思想的机关——头脑。但人們不一定就能好好地运用它去思想。思想的困难是反映现实的思想。各种现实生活（自然的和社会的）都有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一旦经过人的实践而为人的头脑所把握——即在人的头脑中再现的时候，就表现为一定思想的明朗——表现为一定的理性。（在各个不同时代、各个不同的阶级，人們的生活和历史条件不一致，其思想所达到的方面、规模和水准也不一致。）但人們接触现实生活的初步，其所遇到的，是各种复杂的现象。这第一阶段的认识——像大家所熟知的——是感性的认识。人們在其由感性的认识到达理性的认识之前，时常因为感觉的多样性而迷惑起来。这是思想的开端。这开端表现为一种思想的混乱——也就是由感性到理性的过渡。从思想混乱（思想开端）到思想明朗（理性）的过程，是人們认识由浅入深——更深刻理解现实——的过程，是一种治乱絲的过程。完成这种过程的道路是曲折的。在这里，人們必須在实践上更深入地、更全面地与现实生活融合为一；必須对于现实生活的各个具体方面，对于那现实生活的丰富材料，加以更多的熟习，加以更多的搜集、校勘、梳理、揣摩、思索、解剖，向人請教，与人讨论，藉以启发思想，并且要时常纠正或否定自己已经有的思想（警戒片面性，不为成见所蒙蔽），不断向自己挑战，而后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即思想的明朗，即看出了事物的条理，即把握了一定事物的规律——再把这种结论付之实践的反复考验。经过实践的考验，或许这结论还是不完全的，那末，就要加以修改，补充；或许这种结论竟然是错误的，那末，在思想工作，就要重新来一次。这种思想曲折的过程是艰苦的过程，许多人时常不愿意这样走到底，半途而废。

中国人爱说所谓「通人」。所谓「通」应该是对于一定事物的精通，也就是对于一定事物之思想的明朗。这种「通人」是难得的。许多人知道这种「通」之可贵，可是并不愿意经过一番实践和思想的痛苦，而即希望马上变为通人。记得年幼时候，老前輩说过这样的故事：某人本来不算聪明，有一次偶然看到地面上湧出一股泉水，他就掬起来喝，那泉水马上靜正下来，而那人因为喝得这所谓「天地之精英」，从此就聪明不可一世，成为先知。这个故事是代表思想懶汉的一种梦想。有人梦想着某一天能遇到这种类似的奇蹟，使自己“突如其来”，而豁然贯通起来。可是现实的思想终究不是依赖梦想，而是依赖思想的现实，即对于现实生活的各方面，要有百折不磨的实践磨练与思想钻研。

聪明是好的。有狭义的聪明，有广义的聪明。平常人的所谓聪明，往往是指那个人本来的素质而言，这是狭义的。广义的聪明，应该是对于事物之洞彻而灵活的精通。从前面一个

意义来说：聪明并不难得，这种聪明人到处皆是，而聪明人也容易开花（容易有些粗浅的表现），但开花却不一定就会结出果实来。广义的聪明是结出果实，这是真正的聪明人，这就需要经过一番实践和思想的痛苦；至其结出的果实，则又因为地土、气候、方向和培植方法等等不同，而大有程度之分。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是无产阶级的战斗代表，所以，就代表着全人类最深远、最普遍的利益，因此在思想上是最没有成见的，而其眼光是最放得最深远，也最广阔，同时又有人类最丰富的知识积累，供其采择吸收，这些就指出了其思想上的成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表现了的——是前无古人，而能够发现了就会发展、革命运动各种规律的秘密，创造了历史唯物论。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处在人类有史以来社会最动荡、生活最复杂、斗争最激烈的时代，要洞察事物各种规律，就更不是一件那末“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容易事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与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是一定做不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聪明是上进广义的聪明，而其聪明之所以为聪明，就更需要力量：第一，如果不是把自己的全生活、全精神和无产阶级、全体人民的现实斗争融洽在一起。第二，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在工作上的切实、刻苦和生动的作风。第三，如果不是从事搜集丰富的材料，而持之有恒，那末，就将不能得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果实来。

“人皆可以为尧舜”。本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如果以为精通理论只是一小部分工作人员所能胜任的任务，那就错误了。精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乃是是可以做到的事情。……为着精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只要有志愿，有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的决心和坚毅品性就够了。如果——举例来说——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这类的科学是可以顺利精通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可以完全精通，就更加不容怀疑了。”（苏共中央关于联共历史简明的教程出版……的决议）可是，许多人却没有志愿，又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决心和坚毅品性，就只好“望洋兴叹”了。

记得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末期，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及其所造成的人们思想的混乱和惊惶失措，使革命为之失败，给了我痛苦的印象，从此，关于追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以及怎样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贯通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件事情长期地旋转在我的脑海。然而十几年的时间，对于我是如此轻易地过去了，虽则也有过去愿，却在思想上没有真正有恒地刻苦用过工夫，也没有真正弄出么什象样的东西来。

中国长期革命斗争的残酷与曲折，表现了我党许多杰出的革命家，而其中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及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本来不能是在实际斗争之外、从天上掉下来的。可是，像我们这样总算是投身在中国革命火炉中，而比较在理论战线上活动的人，对于中国革命理论的创造，竟不能赞一辞，这真是值得惭愧的。

毛泽东同志和康生同志的报告严厉批评过：中国思想界中有些人“言必称希腊”的奇怪现象。这并不是说：外国不需要我们研究。相反：生而为这代中国人，为中国革命者，为中国共产党人，不研究国际状况，同样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的部份，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部份，而我们“党在设定各种口号和指示时”，“是根据对革命运动的具体条件——国内和国际的具体条件周密分析的结果，同时必须顾计到各国革命的经验”（斯大林）。可是，“言必称希腊，死不谈中国”这类倾向的兴趣，却同样是一种思想规避（当然

也是斗争规避)：第一，外国事情或多或少地离我们远些，随便说来也可以或多或少地减轻对于现实斗争的责任；第二，一般中国人的国际知识本来还差得多，夸夸其谈外国问题，就比较容易惊人和骗人。直到今天，谈「希腊」尽管有人，可是真正懂得「希腊」的也毕竟不多，盗袭他人著作当成自己著作的「文抄公」倒是占了一大部。“毛泽东同志说：‘……于是剩下了希腊及外国故事（限于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抽象地搬来的’。”思想的懒汉想在国际问题方面得到思想上的成就，同样地是“难如上青天”的。

像我们这样思想浅薄的人，居然在中国思想界上有点小名，这并不是好事。文化落后的中国，到处是思想学术待垦的荒地，而且，百年来的生活又如此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又如此锐利，任何人只要稍为努力，都可能得到一定的成就；另一方面，民族的文化落后却又可以造成思想界的一种不幸，就是使得人们容易欺世盗名，浅尝即止。毛泽东同志所谓“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对于许多人是很难能的。人们时常喜欢别人家捧场，这却容易致思想于死刑（这种捧场，也曾使我倒退了若干年）。李卜克内西描写过马克思：“花言巧语的说客，对于他是一种厌恶”。谁愿意当马克思的学生，如果忘记了马克思这样的态度，那就不能学得马克思的一点皮毛。可是忘记了马克思这样态度的，固不只一二人而已。

鲁迅这样说过：“我的译著的新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两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还记得是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的手里，那钱上还带有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吧。”《写在愤的后面》许多人因为有了名望而更扯烂污，鲁迅却因为名望更广而更谨慎，这就是鲁迅对于思想的责任感。这就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这就是鲁迅思想（和现实生活在一起）的所以前进不已。没有鲁迅这样思想风度的，先进的都变成落伍的了。

把自己看成神圣，而把别人看成草芥——这也是容易犯的过错。在小生产占优势的中国社会间，伴随着“互相捧场”的习气，又流行着所谓“文人相轻”的习气。一方面，老子天下第一；另一方面，彼此又缺乏有根据的互相批评（剩下浅薄的指摘和恶意的讥笑）。各人的自大帮助了批评的寂寞，批评的寂寞帮助了各人的自大。其实，凡是存在着自大态度的，也就像有人说过的一个比喻：巧筋放进油锅，外形越大，中心越空。文化思想界的独断作风和宗派主义，就是“无知”的表现。批评是智慧的动力。但批评人和接受人的批评都是不容易的。这里一方面需要思想上的无情（在事实和真理面前），另一方面又需要思想上的雅量（同样是在事实和真理的前面）。不幸的，就是：我们时常缺乏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因此也把自己的思想停滞下来。

主观主义是不会有什麼真实的思想出息的，而小生产者自我满足的庸俗气氛，却是培养主观主义的摇篮。唯物论者才会给思想光大的前途，但唯物论却必须多面接触现实生活，从大刀阔斧而又谨慎周密的批评中发展起来。整风运动是思想上的批评运动，而且必须是批评运

动，这个批评运动是由我们党内同志间自我批评出发的，这个出发将成为——而且已表现为——全民族思想批评运动的出发。

必须有自我批评的勇气。必须有受别人批评的勇气。这是我们每个人希望“得道”（无产阶级之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道）的桥梁。这是我们希望在思想上脚踏实地而有所成就的桥梁。

又回到聪明与愚蠢。在高及小学或初及中学，大家都读过彭端淑的一篇文章《为学》，那里写了一个故事：四川有两个和尚，一个是穷的，一个是富的。穷的告诉富的说：“我要到南海去，你看怎样？”富的说：“你有什么凭籍就想去呢？”穷的说：“我凭籍一瓶一钵就够了。”富的说：“我数年来想买舟而下，还不可能，你有么什凭籍就想去啊！”第二年，穷的从南海回来，告诉那个富的。富的有惭色。彭端淑于是写道：“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之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之。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他把这个故事当成聪明与愚蠢的比喻：聪明不一定可靠，而愚蠢不一定可限。是的，聪明与愚蠢，本来没有绝对的界限（不论是从狭义看或广义看）：聪明的可以变成愚蠢，愚蠢的也可以变成聪明。你看：由于社会生活的升沉（以前的阶级不提它吧），资产阶级就是从聪明到愚蠢的，而无产阶级却从“愚蠢”到聪明。无产阶级是代表全人类的历史上最后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解放及是人类智慧之无限的发展，而这个阶级也将消失其为阶级，所以，这个阶级就不会由聪明返到愚蠢。那一个人愿为无产阶级服务，而学得这个阶级的作风，那末，愚蠢将一定变成聪明；但是，反之，如果不肯学得这个阶级的作风，那末，那一个人的聪明，也还是可以——离开无产阶级——变成愚蠢的。

摘自《解放日报》 1942.8.28.